



清史研究丛书

# 清朝的国家认同

“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刘凤云 刘文鹏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清朝的国家认同

“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刘风云 刘文鹏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刘凤云, 刘文鹏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清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2424-7

I. ①清…

II. ①刘…②刘…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3313 号

清史研究丛书

**清朝的国家认同**

——“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刘凤云 刘文鹏 编

Qingchao de Guojia Rento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印**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28.25 插页 2

**字 数** 410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朝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将清朝置于内亚这一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颇有借鉴意义。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还值得商榷。本书除选辑国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刘风云**，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到日本东海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并进行合作研究。著有《清代三藩研究》、《吴三桂传》、《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

**刘文鹏**，河北宁晋人，先后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曾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李鸿章外交之道》（合著）等。

清史研究丛书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戴 逸 李文海

**主编**

黄兴涛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成崇德 华林甫 刘凤云 祁美琴  
杨念群 何 瑜 陈 桦 孟 超  
张世明 张永江 夏明方 黄爱平

**秘书**

谭徐锋

##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原由戴逸先生发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1988年开始至2001年，它曾推出《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戊戌思潮纵横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八卦教》、《明清农村商品经济》、《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晚清乡土意识》、《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乾隆帝及其时代》、《洪亮吉评传》、《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13部力作，在清史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的出版一度中断。现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从今年起将其恢复起来。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

“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

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7月

##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 16 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

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园。

戴 逸

1988年1月

## 序 言

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来思考国家的历史和未来，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也使得人们在对群体差异强调的基础上获得的价值认同呈现多元化的结果。20 世纪末，中国史学在历经变革与创新后，将一个个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呈现给学术界，“新清史”就是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有关清史研究的新学派、新范式，它带给学界以新的历史诠释。

一个时期内，西方学术界曾立足于“欧洲中心观”的视角，以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来解读中国历史，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置于其“冲击—反应”的话语模式中，以主观的描述把中国打成一个本质上惰性十足的传统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在王朝的反复循环中再生产着自己的历史，直到西方世界发出的现代化冲击才有所改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迎来了新的挑战。先是，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研究范式的兴起，并构建出“晚期帝国”的研究框架，这一研究框架试图以本土模式重新确定和评价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它提供了一个根据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原动力观察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研究路径，于是清朝被定位在中国历史上的晚期帝国时期。但此后不久，随着“新清史”的热议，“晚期帝国”的研究框架也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化，“新清史”成为美国甚至西方近年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

与“晚期帝国”的研究框架以“中国中心观”为出发点，强调中国与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相割裂的研究不同，“新清史”则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

的多民族的帝国，从早期近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历史发展。他们或者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者称清王朝“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政治遗产与演化的更广阔的情境中发生的”，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即蒙古草原文化对清朝的影响；或者直言清王朝作为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强调中国是明代的中国，其有效统治是中国内地，而将清朝剥离于中国之外。其共同之处就是都否认清朝曾经表现出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洲统治者在与汉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已将自身的满洲元素融合与放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情境之中。质言之，“新清史”就是强调清朝与历代汉人建立的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新清史”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在肯定它给清史研究从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其诸多的观点予以了回应，其差异性引发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争鸣。事实上，“新清史”所涉猎的问题，诸如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边疆的特殊化治理，满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只不过由于治学的路径、研究动因、历史书写等诸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所关注的相同问题没能产生聚焦效应和实质性碰撞，而借助此次学术会议推出以学术争鸣为目的的文集，无非为学者们的阐发、交流和交锋提供了直接的“靶心”和场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信息传递、出版时限，以及文集的篇目等诸多原因所限，这里，我们只能遗憾地将部分文章汇集到这本集子中。按惯例，采编诸家之言，梳理观点，评点文字，施以观采损益，乃选编者之担当。然而本书乃集中外史学名家之精粹，涉笔缀文，话题多精彩纷呈，论理掷地有声。而讨论内容之宏阔广博，认知识见之深刻透彻，实非我等之学力在短时间内所能准确把握并付诸实施的，尤其是深藏其中的“寓言”，以及它们在日后的累积影响，也只能期待在将来不断发展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求证。本文集循“新清史”之端绪，经粗略钩稽，将选

入的 21 篇文章按照主题析为五个部分，目的在于归纳要旨、推介文章，以呈导读之效。然而这种主观的划分实在难求其科学性，因为各文关注的问题与形成的观点、探讨的理论往往并不一致，论说与问题的交错、观点与引申话题的差异都是很难兼顾到的。所以，在采撷诸文之要义时因难能条举件系而恐有偏差和忽略。此外，对于学者们诸多的精辟观点及理论阐发也只限于所收录文章。

对清王朝“汉化”的质疑当为“新清史”的缘起，也是文集集中讨论的第一个主题。1967 年，何炳棣发表《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政策的学术观点。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的文章即针对何炳棣的“汉化”观点而言，来自于 1996 年她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的演讲。罗友枝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一个帝国缔造模式，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如何炳棣所说的“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持了自身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从强调满文档案的使用出发，将满洲称为征服精英，强调他们在非汉族征服政体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强调清王朝代表了东亚和内亚融合的最终阶段。意在说明“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是一想象的共同体等，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的讨论要求。

何炳棣随即撰文回应，指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须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并重申当年的观点，认为满族汉化的程度相当之高，程朱理学是汉化的核心，至清代中国才成为一个严格遵守正统儒学的国家。而且正是这种体系上的汉化政策，使中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何炳棣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

罗友枝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二人在观点上的对立，被美国清史学界称为一场著名的论辩，并由此引发了“新清史”诸多命题的讨论，而强调“多元认同”与单纯的“满洲认同”也成为中外学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柯娇燕 (Pamela K. Crossley) 于文中使用清代普世皇权中“同心性”或“共主性”的概念，通过讨论清代皇帝主要是乾隆帝各种身份的相互关联与混杂性，说明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地扩张。她从清代皇权一部分源自东北的可汗制度阐述了清朝没有汉化的观点，强调清朝统治者虽已完成了从可汗到皇帝的角色转换，然其可汗身份依然保留，可汗制体现在对八旗统治的实际效用，它包括要求旗人讲满语、信奉萨满教等。而被纳入八旗的辽东汉人，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是一种可汗制关系，只有中原地区的政治精英认为他们处于清朝的皇权统治之下。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在清朝统治者构建的天下秩序观里，“满洲”或者“中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郭成康虽以《也谈满族汉化》为题，但他没有重申何炳棣的“汉化”理路，而是从不同于以往满族单纯被动接受汉化的思考角度，通过对清前期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考察，阐述了满族如何自觉抵抗汉文化的融合和侵蚀，如何裁量、重塑和支配着汉文化，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表述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而绝非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的满族被汉化、被同化的观点，认为有清三百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政治优势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见解在中国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关“种族”、“族群”和“民族”的讨论构成文集的第二组内容。关注种族、族群特性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则是史学界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诸学科舶来的产物。倡导者致力于族群意识及其动力过程的观察，通过对族群认同的相关要素，族群之间的种种对立统一和矛盾冲突关系等的分析，对现代国家或政体进行研究。近年，这种研究范式也已影响到“新清史”，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之一。但在对上述概念的解构与使用上，中外学者显然也有着相当的歧异。欧立德 (Mark Elliott)

把种族构建的框架纳入对满汉之间的文化分析，将八旗中满洲、蒙古、汉军的不同群体视作种族的区分，提出“满洲”是通过对其内部不同组成要素的一致性提升后，由国家命名成功构建出的种族群体等观点。他将18世纪清帝对国语骑射，保持满洲“旧制”的强调，以及为解决八旗生计而采取的汉军出旗等措施的实施统统予以种族的解释，认为这是朝廷致力于纯化真正满洲人的行为，是在强化种族等级和重新划分地位界限，而八旗制度的成功保存是满洲种族群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欧立德将其这一研究理念和观点概括为“满洲之道”，而在其背后依然是基于政治考虑的认同问题。

盖博坚(R. Kent Guy)以综合书评的形式，在对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路康乐四人有关“新清史”的著作(以下简称“四书”)进行讨论的同时，以“谁是满洲人?”为命题展开讨论。他认同欧立德的观点，称满洲人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在17世纪至20世纪，由统治中国的使命被组织到一起。且满洲认同的含义是变化的。同时，盖博坚认为还应深入考察满洲人的本性促使他们做了什么?在他看来，满洲人首先是征服者，对东亚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他还指出，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并支持被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而研究清朝的成功还必须从解释八旗的团结和忠诚开始。

汪利平通过对杭州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为城市中的一个群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满汉民族关系变化的纵向考察，讨论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认同问题，并对“新清史”强调“满洲之道”的片面性给予了回应。她认为，旗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不仅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考察，而且必须将其与地方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看。在18、19世纪之交，杭州驻防旗人已由最初的征服者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过程，杭州驻防旗人对杭州的归属感与他们对八旗的认同没有矛盾，即强调多元认同。她认为乾隆帝在不断训诫旗人保持“满洲之道”的同时，其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决策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杭州驻防旗人的进一步地方化。文中还强调清代民族关系并非直线发展的满汉冲突，排满情绪高涨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因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试图对“清代长期的满汉矛盾的目的论”的观点予以修正。

徐凯从对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出发,以大量的史实考察了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他在对民族关系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后,指出少数民族既吸纳他族文化,又顽强地保持本民族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分化到若干民族中而消失。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就体现了这一过程。其观点仍在于强调民族之间的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吸纳。此外,文中也讨论了“满洲化”和“汉化”的问题,指出满洲始终保持着本民族认同性,一方面,对纳入本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实现满洲化,也用暴力手段使得汉族改习满洲风俗;另一方面,满洲为了适应在中原的长期统治,自身也出现了“汉化”的趋势,认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在统治先进民族时所必然发生的事实。其观点与上述中国学者的主张形成呼应。

定宜庄与胡鸿保一文虽然也使用了“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但在叙述方法上与国外学者不同。他们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证方法与以史叙事的书写方式,从对满族族谱的编纂内容等资料的考察中发现,旗谱在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认为族谱反映的是家族乃至族群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有选择地对自身文化体系的整合,并引用满族族谱中各种来源不同甚至血缘不同的群体都将自己祖先的发源地记作长白山的实例,去证明满族的民族认同。指出,满族在饮食、婚丧等习俗上的改变,并不能说明他们从内心改变了原有的民族认同。

第三组文章则以“中国”、“中华民族”的认同为话题,四篇文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清史”有关清朝超越“中国”的认同危机提出了反驳。郭成康从宏观历史叙事出发,诠释了清朝自开国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国”、“天下”的概念内涵。指出满洲开国汗及皇帝的“中国”概念,虽然沿袭了传统儒家的“中国”观,即指汉族王朝治下的中原内地,但他们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他们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辨”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中国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中国”,而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藩服”概念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而

且他认为，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葛兆光先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而将清朝与元朝视为征服政体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论的影响，其观念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融合，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此外，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指出这些叙述立场，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即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他认为，中国自从宋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的“近代性”有关。宋代以后逐渐凸显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意识，使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因此，中国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他直言：有人曾经试图以“民族”、“东亚”、“地方”、“宗教”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史实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呢？

黄兴涛于文中重点讨论了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之间的关系，梳理了“中华民族”这一主题词自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并通过对清末民初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精英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贡献，论证了认同的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是留日的满族学生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他们创办各种报刊，倡导“满汉融和”、“五族大同”，提出了体现各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国族”的称谓。最后黄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时期与标准给予了结论性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这个符号与中国的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完全统一，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后逐渐实现的。